

灵武即位与安史之乱中西北军镇地位的嬗变

岳思彤

摘要 潼关陷落后，朔方军成为平叛关键、肃宗前往灵武即位的传统观点，带有“倒放电影”色彩。安史之乱初期，受西北蕃落接连动乱等现实因素影响，肃宗辗转北上灵武，又逐步南下，根据各种信息反复决策、不断调整行迹。玄宗末年以河陇军将主持潼关守军、以朔方军主力进击河朔的战略安排，使河陇军在玄肃之际的乱局中居于政治与军事上的关键地位。不同于玄宗尚欲维持西北边防体系的态度，肃宗为收复两京，着力经营天水、扶风一线，并持续征召边军入援。收复两京诸役中，河陇军连续作战失利，与回纥关系密切的朔方军及较晚被征召的安西、北庭军渐在军事上发挥更重要作用。安禄山起兵后肃宗的行动与西北军镇地位的嬗变，展现叛乱冲击下国家军政格局重构的过程。

关键词 安史之乱 灵武即位 河陇 西北军镇

作者岳思彤，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上海 200433）。

中图分类号 K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6)05-0184-14

在安史之乱引发的诸多历史变动中，唐前期苦心经营的北部边疆防御体系的崩坍，及边境节镇势力的此消彼长，是影响颇为深远的的一个方面。传统观点认为，叛军与唐军的斗争，最初表现为安禄山统领“东北三师”与哥舒翰统领“西北二师”间的对抗。随着哥舒翰兵败潼关、河西陇右兵溃亡，肃宗在朔方军治所灵武即位，朔方军转而成为平定叛乱、中兴唐室的关键力量。^① 上述观点大致勾勒出安史之乱后朔方军崛起的经过。在国都沦陷、皇位更迭的历史背景下，边境节镇势力变化的意义溢出边疆防御本身，与国家权力格局重构乃至皇权交争联系起来，深刻影响中晚唐的政治军事格局。

不过，与上述几乎成为研究共识的观点不同^②，本文尝试在重新考察肃宗北上经历、灵武行在构成及玄、肃之际军事动向的基础上，提出一项新的观点：安史之乱爆发后，朔方军的崛起其实相对晚近，前人眼中朔方军自灵武即位后拥有的重要地位，很大程度是后天塑造的产物。在唐代，玄、肃之际的历史记录因政局混乱，尤多错讹、抵牾。近年学者留意于此，多从“玄、肃之争”角度出发，批判史料讳饰、挖掘政治深意。^③ 与此过度强调皇权斗争解释力的研究取径相较，学者对文献编纂如何遮蔽历史线索，尚缺乏足够的警醒。《资

① 陈寅恪：《书杜少陵哀王孙诗后》，《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60—64页；章群：《唐代蕃将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第261—272页；王永兴：《论唐朔方军》，《陈门问学丛稿》，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12—421页；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314—334页。

② 近年，亦有学者留意于肃宗朝的河陇军将，并谈到其在重建禁卫军、平衡朔方军军功方面的作用。参见林伟洲：《安史之乱与肃代二朝新政权结构的开展》，台北县：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71—74页；林伟洲：《河陇军将的参与平乱及安史乱后对其军事人力之派任——以肃代二朝首都防卫为中心》，《唐代藩镇研究论文集》，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6年，第115—132页；陈玮：《新出〈唐曹怀直墓志〉所见安史之乱前后粟特武人动向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16年第3期。

③ 如林伟洲：《中唐政治史研究论集》，台北：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17年，第55—79页；张驰：《唐国史对肃宗北上灵武事的历史书写》，《史林》2021年第2期。

治通鉴》《旧唐书》等基本史籍，是今人了解历史事件的主要依据，其修撰的史料来源、编纂过程中有意无意的裁剪拼贴，亦预先形塑学者理解、分析历史事件的基本框架。在反省这一点的基础上，本文希望跳出既往研究抽绎的相对简单、明快的历史线索，通过利用多样的传世文献与石刻材料，努力揭示“朔方军崛起”这一由果推因式的政治发展谱系下，玄、肃之际西北诸军镇势力演变的复杂过程，并借此探究叛乱冲击下唐代国家权力格局的重构。

一、肃宗北上灵武再析

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安禄山起兵半年之际，哥舒翰主持的潼关守军迎敌不利，潼关陷落。当消息传至长安，玄宗君臣仓皇出逃。当月丁酉（15）日，太子李亨在马嵬与玄宗分别，携东宫亲从辗转北上，最终于七月辛酉（9）日抵达位于关内道北部的灵武郡。^①

关于肃宗分兵、北上灵武一事，《资治通鉴》曾详细记录马嵬驿之变后，建宁王倓等劝肃宗驻留，“收西北守边之兵，召郭、李于河北，与之并力东讨逆贼”，又建言“朔方道近”，宜“速往就之”的经过。^②《旧唐书》卷184《李辅国传》亦有献计分兵，“北趋朔方，以图兴复”的类似记载。^③黄永年曾批评此类记载属事后附会，认为肃宗当时只能倚靠朔方军，但待朔方留后人员奉迎、表明态度后，才敢决策前往灵武。^④亦有学者由玄宗《銮驾到蜀大赦制》中“命元子北略朔方”等记载，提出肃宗是奉玄宗之命，北上灵武收兵。^⑤以上意见在细节上多有出入，不过基本都认为前往灵武是肃宗分兵后的主要目标。

仔细推敲，此种聚焦肃宗分兵决策中灵武及朔方军重要性的观点，颇有“倒放电影”的色彩。《旧唐书》卷116《承天皇帝倓传》中，收录《资治通鉴》载分兵前李倓建言更原始的版本，记：

倓于行宫谓太子曰：“逆胡犯顺……殿下宜购募豪杰，暂往河西，收拾戎马，点集防边将卒，不下十万人，光弼、子仪，全军河朔，谋为兴复，计之上也。”^⑥

《资治通鉴》载肃宗驻留后“莫知所适”之际李倓发表的议论，则为独出记录，全文为：

殿下昔尝为朔方节度大使，将吏岁时致启，倓略识其姓名。今河西、陇右之众皆败降贼，父兄子弟多在贼中，或生异图。朔方道近，士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无贰心。贼入长安方虏掠，未暇徇地，乘此速往就之，徐图大举，此上策也。^⑦

这是两段大相径庭的记载。前段引文泛泛提及朔方军今在河朔，且言河西多士马、“暂往河西”。后段引文则指斥河陇之众“皆败降贼”“或生异图”，明确提出前往朔方的策略。学者由裴冕为河西行军司马、与朔方无关，曾提出后段引文全非事实、不足凭信。^⑧但简单否定相关记录前，有必要对肃宗北上经过展开重新梳理，以更好地理解两段引文的差异，并对北上灵武一事得出更为清晰的认识。

梳理史料，肃宗与玄宗分别后，未直接北上，而是先回至渭北便桥一带，误与潼关散卒交战、多有伤亡后，方调转方向，前往奉天、永寿。似肃宗分兵之初，一度有回京想法。次日，肃宗奔抵邠州新平郡，己亥（17）日抵达泾州安定郡。两日间，肃宗斩杀弃郡而走的新平太守、安定太守，昼夜奔驰，“士众器械亡失过半，所存之众，不过一旅”。由奉天经新平郡、安定郡，顺着河谷前行，下一站便是原州平凉郡。不过，庚子（18）日，他们却突然向东，转至彭原郡乌氏驿。^⑨时任彭原太守李遵有墓志传世，说：

明年长安覆没，玄宗逊于南京。便桥之役，我师败绩。自新平属之五原，二千石皆反为贼守。肃宗以余骑十数次于彭原，公顿首迎谒，且愤且喜。因献衣服鞍马，泣问大计。乃悉发仓库，募敢死士，获九百人。公自誓众，扈辇而北。翌日师次临泾，又北至于平原（凉）。收携贰逆命者，斩之以殉。破其余党，进幸灵武。旬日众至数万，王师遂张。^⑩

①②⑦ 《资治通鉴》卷218“唐肃宗至德元载（756）”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974—6981、6975—6977、6977页。

③ 《旧唐书》卷184《李辅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④⑧ 黄永年：《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第352—356、355页。

⑤ 张驰：《唐国史对肃宗北上灵武事的历史书写》，《史林》2021年第2期。

⑥ 《旧唐书》卷116《承天皇帝倓传》。

⑨ 《旧唐书》卷10《肃宗纪》；《资治通鉴》卷218“唐肃宗至德元载”条，第6977页。

⑩ 独孤及撰，刘鹏、李桃校注：《昆陵集校注》卷11《唐故特进太子少保郑国李公墓志铭》，沈阳：辽海出版社，2006年，第247页。

这段材料提供许多有趣的细节。据墓志记载，此时关内道地区自新平郡至盐州五原郡，太守“皆反为贼守”。《旧唐书》亦记“太子既北上，渡渭，一日百战”^①。如此局势下，肃宗一行既要防范身后未知何时追来的叛军，又需警惕北奔途中或许叛变的太守。自奉天北上，主要有两条路线。其一是经邠州、宁州彭原郡、庆州顺化郡至灵武。其二，经邠州、泾州至原州，继而既可北上至灵武，又可向西，经会州至凉州。^②现实中，肃宗至新平郡后，未直接前往由“皇唐太祖景帝七世孙”李遵主政、可更快抵达灵武的彭原郡，而转向第二条路线的下一站、太守已反为贼臣的泾州安定郡。

在两日内快速行进、经两郡而斩两郡太守，显示至少此时，肃宗是计划沿着第二条路线前行。这与《旧唐书》载李俊“暂往河西，收拾戎马，点集防边将卒”的建言恰好相应。平凉富有牧马。^③天宝十三载（754）安禄山兼闲廐、陇右群牧等使，曾奏“臣差判官、殿中侍御史张通儒，群牧副使、平原太守郑遵意等，就群牧交点，总六十万五千六百三头匹口”^④，此“平原太守”，郁贤皓认为是平凉太守之讹。^⑤郑遵意与安禄山关系密切^⑥，天宝十五载六月前后，他是否仍任平凉太守，不能遽断。不过此时的平凉太守未必支持唐室，大概是肃宗在长途奔波、兵员减耗后，转向彭原征兵的重要原因。根据李遵墓志，肃宗抵达彭原时只有“余骑十数”。如此窘迫之下，宗室李遵竭力相援，为肃宗募得九百死士，提供衣服鞍马，并亲自加入肃宗队伍。次日，补足力量的肃宗一行回师临泾，继往平凉，“收携贰逆命者，斩之以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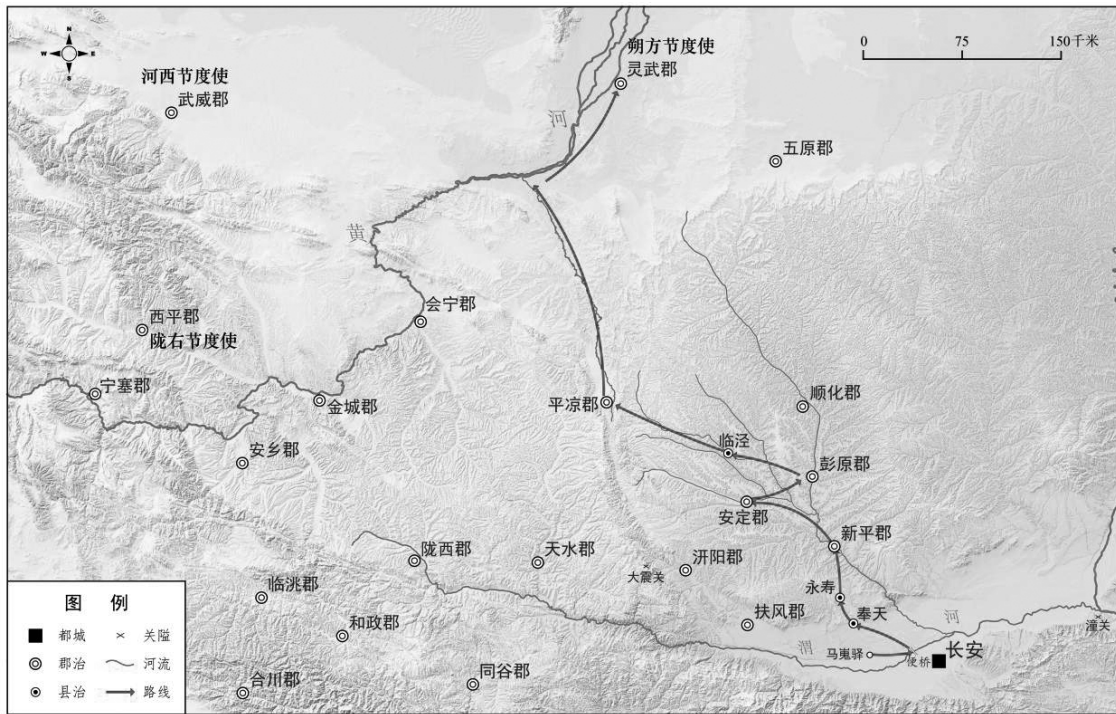


图 1 肃宗北上路线示意图

(根据《中国历史地图集》唐代部分改绘)

肃宗一行到达平凉在六月辛丑（19）日，最终抵达灵武在七月辛酉（9）日，其间停留将近二旬。驻留平凉期间，肃宗有几项收获，首先是“搜阅监牧公私马，得数万匹”，并募得五百余兵。法律禅师墓志、塔铭

① 《旧唐书》卷 116《承天皇帝俊传》。

②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 1 卷《京都关内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 179—206 页。

③ 参马俊民、王世平：《唐代马政》，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15—25 页。

④ 《资治通鉴》卷 217“唐玄宗天宝十三载”条，第 6923 页；《唐会要》卷 72《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1543 页。

⑤ 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297 页。

⑥ 《新唐书》卷 194《甄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

记他当时驻蹕平凉，亦曾“累进衣马，襄助王师”。^①其次，肃宗驻留平凉日久，消息渐传入关内，“时贼据长安，知上治兵河西”。其三，肃宗驻平凉后，“数日之间未知所适”，心中仍对接下来的行动举棋不定。可以想见，肃宗应较早向边境节镇去信——如朔方，可能也包括河陇，此时正焦急等待各方回音。数日之后，朔方留后杜鸿渐、节度判官崔漪等遣宗室李涵自灵武前来，奉笺相迎，“上大悦”。与此同时，河西留后裴冕新授御史中丞赴阙，亦见肃宗于平凉。^②

裴冕其人，天宝十二载（753）八月被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表为行军司马。^③后哥舒翰入朝，“裴冕为祠部郎中，知河西留后，在武威”，继而“哥舒翰东守潼关，累月，奏冕为御史中丞，追赴京”^④，知裴冕新授御史中丞赴京，是哥舒翰所奏。唯哥舒翰守潼关时奏追裴冕，待消息传至河西、裴冕动身东行时，潼关已破。从凉州武威郡前往长安，有南、北两道，其中南道经兰州、渭州、秦州、陇州、岐州抵长安，北道经会州、原州、泾州、邠州抵长安^⑤，平凉郡是北道的必经之所，裴冕便在此与肃宗相会。

史载裴冕在平凉面见肃宗时，“亦劝上治兵于灵武以图进取”。由此回看《资治通鉴》独出的李倓建言，其中“今河西、陇右之众皆败降贼，父兄子弟多在贼中，或生异图”“裴冕衣冠名族，必无贰心”等语，大概是裴冕为肃宗分析局势、介绍河陇境况、亦劝肃宗北上灵武后，李倓所作评述。与河陇相比，朔方军治所灵武郡就在平凉北邻，李涵奉笺前来时“备陈兵马招集之势，仓储库甲之数”^⑥，故李倓建言称“朔方道近，士马全盛”。换言之，《资治通鉴》所载建言，是肃宗一行抵达平凉郡，进一步了解朔方、河陇境况与态度后所献。自长安出奔后，肃宗对何去何从几度犹疑，建宁王李倓亦几度予以建言。《资治通鉴》误将平凉建言系于分兵之初，引起学者的疑问与遐想。

由上，可以看到肃宗与玄宗分别后，根据纷至沓来的各种信息反复决策、不断调整行迹的过程。便桥交战后，肃宗应有着前往京西北地区、积蓄力量的基本考量，但“以灵武为最终去处”并不是一个被始终清晰标举的目标。相反，在很长时间内，河西方向可能是肃宗心中的更优选，因此北上初期，他快速地占据平凉，且在朔方官员前来奉迎、裴冕亦建议前往灵武后，仍犹豫不决。即使最后，肃宗在多方建议下启程前往灵武，途中仍一度欲渡过黄河、保军丰安。^⑦

玄宗方面，虽未必及时掌握肃宗的具体行踪，但对肃宗应召集兵马以备收复两京，当有一定共识。七月壬戌（10）日前后，玄宗在益昌遥诏太子充天下兵马元帅，以裴冕为御史中丞兼左庶子，为之副。^⑧丁卯（15）日，玄宗又在普安郡发布制书，向天下宣示太子“仍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等节度采访等都使，与诸路及诸副大使等计会南收长安、洛阳”及永王等分领诸道的命令。^⑨半个月后《銮驾到蜀大赦制》中的“命元子北略朔方，诸王分守重镇”^⑩，即为对此制的概括与再度确认。由于在玄宗遥诏以前，裴冕已抵达平凉、服务于肃宗，既往研究或联系《冀国公赠太尉裴冕碑》“公以御史中丞，奉诏翼赞元良。释位济河，会于灵武”等记载，提出玄宗出京后，已任命裴冕为左庶子，且命他奔赴灵武与太子相会。^⑪然《冀国公赠太尉裴冕碑》乃大历间元载所作，恐不乏事后讳饰。^⑫更重要的是，如前文所论，在肃宗分兵一事中，前往灵武并非预先确立的清晰目标。

事实上，联系当时局势看，裴冕先行抵达肃宗身边，玄宗复选取他为太子左庶子，未必有何政治上的深

① 赵青山：《唐代法律禅墓志铭、塔铭研究》，《敦煌学辑刊》2018年第1期。

② 本段引史料，并见《旧唐书》卷10《肃宗纪》；《资治通鉴》卷218“唐肃宗至德元载”条，第6978、6980—6981页。

③ 《资治通鉴》卷216“唐玄宗天宝十二载”条，第6919页。

④ 《旧唐书》卷191《金梁凤传》。

⑤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2卷《河陇碛西区》，第341—419页。

⑥ 《旧唐书》卷10《肃宗纪》。

⑦ 丰安一作丰宁。《文苑英华》卷885《故相国杜鸿渐神道碑》，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4663页上栏；《旧唐书》卷10《肃宗纪》。

⑧ 《旧唐书》卷9《玄宗纪下》；卷113《裴冕传》。

⑨ 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36《命三王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55页；《旧唐书》卷9《玄宗纪下》。

⑩ 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79《銮驾到蜀大赦制》，第455页。

⑪ 张驰：《唐国史对肃宗北上灵武事的历史书写》，《史林》2021年第2期。

⑫ 林伟洲曾论及元载点窜史料的情况，参见林伟洲：《中唐政治史研究论集》，第77—78页。

意或史料上的涂抹，而是时局下的正常选择。长安陷落这年，裴冕五十四岁。他曾任渭南县尉、京畿采访使判官等职，因替得罪伏法的京畿采访使王锜收尸、护葬知名于世。^① 在玄宗朝众多能臣名士中，裴冕似未表现出什么惊人才干。但天宝十五载夏秋之交的此时此刻，他确实是一位关键人物，使其在筭路蓝缕、风雨飘摇的肃宗行在中扮演重要角色。不仅如此，即使在幸蜀路上的玄宗看来，他也是处理关内糟糕局面的重要辅佐。这得益于裴冕过去的身份，哥舒翰的河西行军司马、河西留后。潼关惨败、灵武即位及后来朔方军的崛起，使前人未足重视河西、陇右军在安史之乱中的动向。实际上，随着哥舒翰率军驻守潼关，河陇军一度在玄、肃之际的混乱局势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并深刻影响肃宗的政治决策与军事安排。由此，可借裴冕之得用，将研究视线暂从朔方转向河陇。

二、玄肃之际的河西、陇右军

在玄宗朝西北诸军镇中，相较于管兵二万余、马数千匹的安西、北庭，管兵七万上下、马逾万匹的河西军、陇右军、朔方军，是距京畿稍近且殊为强盛的三大藩镇。^②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中旬，听闻“禄山定反”的玄宗，先后派遣封常清（时任北庭都护、安西节度使）至洛阳募兵守备，高仙芝（前安西节度使）统军屯驻陕州^③，并紧急征召河西、陇右、朔方兵马入援。调兵之初，玄宗以安西、北庭宿将领军，以河西等镇兵马为防御主力。不过，在仓促应对来势汹汹的叛军的过程中，河陇军渐居于军事上的中心地位，一批河陇官员亦由此活跃于政治舞台。

关于河西等军入援的经过，玄宗《亲征安禄山诏》提供一条关键记录。十二月壬辰（7）日，玄宗下制，欲“巡幸洛阳”、御驾亲征，制文中一段说：

其河西、陇右、朔方，除先发蕃汉将士及守军郡城堡之外，自余马步军将兵健等，一切并赴行营，各委节度使统领，仍限今月二十日齐到。^④

前人由“除先发蕃汉将士”一句，提出玄宗曾两次征召边军入援。^⑤ 然更为关键的，是“仍限今月二十日齐到”，它说明这是一条初次征召尚未就位，便紧急追加的命令。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丁丑（22日，一作甲申29日），玄宗命高仙芝为副元帅“统诸军东征”，继而出钱帛于京师募兵。次日，高仙芝统飞骑、彍骑、京师新募兵及“朔方、河西、陇右应赴京兵马”自长安出发，前往陕州屯驻。^⑥ 高仙芝受命、出征间隔数日，其间尚在募兵，反映他受命时的“统诸军出征”更多是一项计划。考虑到十一月丙子（21日，一作癸酉18日）玄宗曾撤换安禄山亲旧安思顺的朔方节度使衔^⑦，唐廷大概在朔方换帅至高仙芝受命间，初次发布召集河西、陇右、朔方军入援的命令。初始计划中，高仙芝应统禁军、新募兵及入援边兵镇守陕州，与洛阳封常清军形成前后两道防线。但叛军进展太速，超出玄宗君臣的心理预期。紧张局势下，不待边兵到位，高仙芝便先行出发。随着叛军快速渡过黄河、直指洛阳^⑧，玄宗不得不将边兵征召范围扩大到“守军郡城堡之外”全出，且加快调集速度，要求“仍限今月二十日齐到”。

此时，西北边兵处于陆续入援的状态，然战局发展仍比唐廷计划得更快。十二月丁酉（12）日，洛阳沦陷，封常清、高仙芝仓皇退守潼关。癸卯（18日，一作丙午21日），玄宗命斩高、封二人。病废在家的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被命为副元帅，“将兵八万以讨禄山”^⑨。这一系列人事调整，恰好发生在约定的十二

① 《旧唐书》卷113《裴冕传》；《文苑英华》卷885《冀国公赠太尉裴冕碑》，第4665页下栏。

② 《通典》卷172《州郡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479—4482页。

③ 《资治通鉴》卷217“唐玄宗天宝十四载”条，第6934—6937页；《旧唐书》卷104《高仙芝传》；卷104《封常清传》。

④ 《资治通鉴》卷217“唐玄宗天宝十四载”条，第6938页；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119《亲征安禄山诏》，第626页。

⑤ 张驰：《西北军镇格局与安史之乱初期玄、肃二帝权力关系》，《史学月刊》2025年第12期。

⑥ 《资治通鉴》卷217“唐玄宗天宝十四载”条，第6937页；《旧唐书》卷9《玄宗纪下》；卷104《高仙芝传》。围绕安禄山起兵，《资治通鉴》《旧唐书》系日多有出入，需相互参读。

⑦⑨ 《资治通鉴》卷217“唐玄宗天宝十四载”条，第6937、6939—6943页；《旧唐书》卷9《玄宗纪下》。

⑧ 《旧唐书》卷9《玄宗纪下》。

月二十日前后。史载高仙芝退守潼关时“持乌合之众，驱市人以战”，受戮时“召募兵排列在外”^①。大概前线换帅之际，边兵大部队才将将抵达。

于是叛乱爆发不过一个多月间的连锁反应，将哥舒翰推向潼关统帅的位置，并将一大批河陇官员推向历史前台。西北诸镇中，河西、陇右地缘相接，具有密切的军事联系。^② 天宝十二载夏秋之际，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接替安思顺出任河西节度使，自此主掌河、陇两镇。^③ 翌年哥舒翰论功，为了解两镇情况提供重要参考。既往研究受《资治通鉴》行文影响，曾以为哥舒翰此次论功是为与安禄山竞相笼络亲信，且由哥舒翰与安思顺的矛盾关系，及所谓只为陇右军将论功，提出河、陇二镇长期不和，哥舒翰任用陇右嫡系、压制河西军将，影响唐军平叛进程等推论。^④ 较之《资治通鉴》，《册府元龟》提供一份更原始的记录，记天宝十三载三月哥舒翰“破吐蕃洪济、大莫门等城，并牧九曲，其将咸来策勋”，策勋名单为：

陇右十将、特进兼火拔州都督、燕山郡王火拔归仁加骠骑大将军。河源军使王思礼、陇右兵马使彭元曜加特进。陇右同节度副使张擢，陇右都虞候兼安乡郡太守管崇嗣，陇右同节度副使兼莫门军使、临洮郡太守成如璆，陇右同经略副使兼宁塞郡太守康承献，陇右讨击副使鲁灵，皋兰府都督浑惟明，并加云麾将军。积石军使臧奉忠、镇西军使郭光朝、河西经略副使苏法鼎为左金吾等卫员外大将军，陇右讨击副使郭英义、彭体盈为左羽林军员外将军，并充本道驱使。^⑤

此份名单记录许多受赏军将，但仍不完整，如王难得“十三载，从收九曲，加特进”^⑥，不见载录。史载哥舒翰论功后，“又奏”严武为节度判官、吕諲为支度判官、高适为掌书记、曲环为别将。^⑦ 大概当时陆续有策勋、奏官之举。此次作战的洪济城、大莫门城及“九曲”之地，主要位于陇右宁塞郡、安乡郡、临洮郡以西，是玄宗时陇右唐军常与吐蕃交战之地。^⑧ 主战场在陇右，故策勋名单中多为陇右军将，且有宁塞、安乡、临洮三郡太守，及积石军、镇西军（分别位于宁塞郡、安乡郡^⑨）军使。陇右军将外，名单中也有河西将领的身影，如河西经略副使苏法鼎、皋兰府都督浑惟明。^⑩ 客游河西的高适，亦在此役后被奏为河西掌书记。^⑪ 兼领河西后^⑫，哥舒翰将一些河西兵马调赴陇右战场，从两镇将士联动作战、共同受勋看，哥舒翰主持下的河、陇两镇，很难说存在明显的、压制性的矛盾。

更重要的是，上述河、陇官员中的相当一部分，很快又出现在驻守潼关队伍中。哥舒翰代替高仙芝主持守军后，延请萧昕入幕^⑬，又：

以田良丘为御史中丞，充行军司马，以王思礼、钳耳大福、李承光、苏法鼎、管崇嗣及蕃将火拔归仁、李

① 《册府元龟》卷443《将帅部·败衄第三》，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5257页下栏；《旧唐书》卷104《封常清传》。

② 刘子凡：《唐代西北诸节度的轻重格局》，《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

③ 《旧唐书》卷104《哥舒翰传》；《资治通鉴》卷216“唐玄宗天宝十二载”条，第6919页。

④ 张驰：《西北军镇格局与安史之乱初期玄、肃二帝权力关系》，《史学月刊》2025年第12期。

⑤ 《册府元龟》卷128《帝王部·明赏第二》，第1534页下栏—1535页上栏。引文有节略，原文讹误如“大拔州”“鲁炤”“汉门军”“高兰府”等，已径改。

⑥ 《旧唐书》卷183《王子颜传》。

⑦ 《资治通鉴》卷217“唐玄宗天宝十三载”条，第6926页。

⑧ 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39《陇右道上·廓州》，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94—995页；《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上》；《资治通鉴》卷215“唐玄宗天宝二年”条，第6858页；《册府元龟》卷429《将帅部·拓土》，第5117页上栏。

⑨ 《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

⑩ 河西治所凉州界内寄居许多吐浑、契苾、思结部落，皋兰府是其中之一。高适诗《送浑将军出塞》说“子孙相承在朝野，至今部曲燕支下”，也谈到河西燕支山下的浑部。另有东皋兰州，寄在关内道鸣沙界，都督浑释之在朔方军任职。参见《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卷40《地理志三》；卷134《浑瑊传》；高适著，刘开扬笺注：《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57—258页。

⑪ 《旧唐书》卷111《高适传》。

⑫ 哥舒翰兼领河西与收九曲时间相近，《资治通鉴》系于战事结束后，《新唐书》系于战前。高适诗《自武威赴临洮谒大夫不及因书即事寄河西陇右幕下诸公》，叙及吐蕃战事中高适从河西治所武威赶往前线以谒见哥舒翰的情形，知战事结束前哥舒翰已兼河西节度使。参见《资治通鉴》卷216“唐玄宗天宝十二载”条，第6918—6919页；《新唐书》卷135《哥舒翰传》；高适著，刘开扬笺注：《高适诗集编年笺注》，第253—254页。

⑬ 《旧唐书》卷146《萧昕传》。

武定、浑萼、契苾宁等为裨将，河陇、朔方兵及蕃兵与高仙芝旧卒共二十万，拒贼于潼关。^①

其中，火拔归仁、王思礼、管崇嗣及苏法鼎，皆见于天宝十三载策勋名单，为陇右、河西宿将。田良丘原为河西节度判官，天宝十三载僧不空应哥舒翰之请前往河陇，驻蹕武威郡开元寺，田良丘曾笔受译经。^②李承光天宝间为河西兵马使^③，高仙芝退守潼关时“令索承光守善和戍”，死后“以将军李承光摄领其众”^④，颇疑“索”为“李”之讹。李承光较早出现在潼关，未知是早已在京，还是入援的先头部队。蕃将中，至少浑萼、契苾宁当来自河西，为凉州界内浑部、契苾部首领。^⑤此外，原河西掌书记高适、陇右将王难得，也佐哥舒翰守潼关。^⑥稍晚，陇右将鲁炅、曲环还被派往南阳驻守。^⑦

潼关守军中，亦有与河、陇同时受到征召的朔方军将士的身影，如朔方十将臧晔在潼关“分兵水战”，溺河而死。^⑧入唐吐蕃、朔方节度副大使论诚节，统领士马与哥舒翰“犄角扞寇”。^⑨但河陇将士更多，且明显享有军队统领的主导权。郭子仪接任朔方节度后，受诏“以本军东讨”，十五载春又“益选精兵”进军代州、出井陘，主要在河东、河朔一线作战。^⑩杜鸿渐神道碑记安禄山起兵后，唐廷“命信臣捍扼二华之险，守河渭之隘，以挫其锋。分河陇材官据南阳，当宛叶，以遏其势。朔方节度、中书令、汾阳王发缘边利兵略云中，出井陘，以制其后”^⑪，形成河陇等军镇守潼关，朔方军主力攻敌侧翼的应敌策略。

与此战略安排相应，当潼关陷落，唐室出奔，从历史现实条件来说，关内地区可最直接、快速得到利用的力量，便是四散的潼关败卒、河西陇右残兵。天宝十五载七月十二日，肃宗于灵武即位，任命大臣曰：

以杜鸿渐、崔漪并知中书舍人事，裴冕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改关内采访使为节度使，徙治安化，以前蒲关防御使吕崇贲为之。以陈仓令薛景仙为扶风太守，兼防御使；陇右节度使郭英义为天水太守，兼防御使……大将管崇嗣在朝堂，背阙而坐（后略）。^⑫

肃宗被朔方官员迎至灵武，受命为宰相的，却是河西幕佐裴冕。至德二载（757）收复两京大赦说“朕龚行天罚，誓兵朔野。幸以一旅之众，遂成九有之师。言念经纶，岂忘締构”，奖赏灵武元从裴冕、李辅国、李遵、管崇嗣、李鼎、王晔。^⑬裴冕名居第一。细审两份名单，灵武行在除杜鸿渐等朔方留守官员，李辅国等肃宗亲信随从，李遵等关内道官吏外，还有多位潼关败将、河陇旧臣。

回顾潼关之战，唐军败后，哥舒翰被火拔归仁执送叛军，钳耳大福、苏法鼎、管崇嗣等西走入关，潼关周边州郡长官，如河东防御使吕崇贲、华州防御使魏仲犀等“皆弃郡走，所在兵将，解辮而散”^⑭。苏法鼎嗣后行踪不明。钳耳大福在至德三载（758）正月受封^⑮，可能稍晚加入收复两京队伍。魏仲犀南下奔赴玄宗行在。^⑯管崇嗣、吕崇贲则最早来到肃宗身边，成为灵武行在的重要人物。

灵武行在中的潼关败将、河陇旧臣，还不止于此。王难得“关门不守，从肃宗幸灵武”^⑰。曹怀直旧为哥

① 《旧唐书》卷 104《哥舒翰传》。

② 圆照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 15，《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 55 册，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第 720 页中、下栏。

③ 《文苑英华》卷 608《为人请合附表》，第 3151 页下栏。

④ 《旧唐书》卷 104《高仙芝传》；《资治通鉴》卷 217“唐玄宗天宝十四载”条，第 6943 页。

⑤ 《旧唐书》卷 40《地理志三》。

⑥ 《旧唐书》卷 111《高适传》；卷 183《王子颜传》。

⑦ 《旧唐书》卷 114《鲁炅传》；卷 122《曲环传》。

⑧ 臧晔墓志，参见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一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 年，第 230 页。

⑨ 《文苑英华》卷 909《骠骑大将军论公神道碑》，第 4784 页上栏。

⑩ 《旧唐书》卷 120《郭子仪传》；《资治通鉴》卷 217“唐肃宗至德元载”条，第 6953、6957、6959—6960 页。

⑪ 《文苑英华》卷 885《故相国杜鸿渐神道碑》，第 4663 页上栏。

⑫ 《资治通鉴》卷 218“唐肃宗至德元载”条，第 6982—6983 页。

⑬ 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 123《至德二载收复两京大赦》，第 658 页。

⑭ 《册府元龟》卷 443《将帅部·败衄第三》，第 5258 页上栏。

⑮ 《宋本册府元龟》卷 131《帝王部·延赏第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第 119 页下栏。

⑯ 《颜鲁公文集》卷 12《正议大夫上柱国国子司业颜君神道碑铭》，颜欲章编：《颜氏传书》第 22 册，明万历三十六年刻本，第 4b—5a 页。

⑰ 《旧唐书》卷 183《王子颜传》。

舒翰讨击副使，“今上幸灵武，迫入宿卫”^①。论诚节父子在潼关破后“以智信保全所领之军，驰于灵武，扈从肃宗”^②。约七月下旬，哥舒翰支度判官吕諲“驰赴行在”，超拜御史中丞。他在乾元二年（759）拜相，是肃宗朝第二位出自河陇幕府的宰相。^③代宗大历年间，于邵作《为人请合附表》，记潼关破后李承光“仓卒西还。亦既通表华阳，奉笈灵武。枕干待命，俟期而往。曾未信宿，先朝赐书，敦叙兄弟，如家人礼”，获得“先朝”即肃宗回信。表文记“当是时也，臣亲见之，开缄涕流，是日便发。及至行在，特加天下兵马副元帅，改名匡国”^④。从改名、加副元帅的厚遇看，李承光恐怕是最早抵达肃宗行在的高级将领。他在九月末因追究潼关败责被杀^⑤，故事迹不显。

概言之，肃宗在灵武即位，不天然意味朔方军就此成为政权中的主导力量。在朔方军主力尚在千里之外的河朔地区，而关内道及其周边流散着大量以河陇兵士为主体的潼关败卒，还有许多入唐蕃部、守边将士的情况下，肩负收复京城重任的太子李亨、新皇肃宗，急需具有相关政务经验与人际关系优势的臣子提供帮助，来联络、整合这些兵士群体。潼关破后，关内及其周边的蕃汉军队，既是可能被叛军招徕的乱源，也是可能被肃宗方争取的兵力。从后见之明看，这些军队中的许多曾加入翼卫肃宗的队伍，但对当时人而言，纷杂军事力量的政治向背，尚需沟通、确认与斡旋。

裴冕既得肃宗信重，又被玄宗命为太子左庶子，正在此背景下发生。潼关陷落后，哥舒翰守潼关僚佐如田良丘、高适、萧昕等皆南奔。颜允南神道碑记当时“朝官多出骆谷至兴道，房琯、李华（峒）、高适等数十人尽在”，而田良丘“既败，犹自振矜”，诵表说潼关之败是“运数潜迫，人神同弃。职之人故，匪翰之由”，被颜允南叱责，李峒等“因欲殴（殴）击”。^⑥此种情形下，玄宗令留守本镇、资历更深、正赶赴长安的裴冕辅佐太子收拾残局，确为不二之选。玄宗幸蜀后，陆续将严武、萧昕、高适等哥舒翰旧僚派遣北上^⑦，也可置于此背景下理解。

由上，可初步认识肃宗初年，无论军事上，抑或朝政上，河陇旧臣及其人际关系发挥的重要作用。肃宗即位不久，曾传信安西请求援兵，时安西节度副使李嗣业与节度使梁宰谋“且缓师以观变”，被段秀实责以大义后，才如数发兵。^⑧李嗣业等所称“观变”，既可能指唐廷、安禄山之变，亦可能指肃宗、玄宗之变，抑或两者兼有。彼时，这种“缓师以观变”的心态盖非安西一镇所有，故河陇系官员、将士的翊戴，于肃宗朝廷自具有非常之意义。

三、潼关陷落后的军乱与玄、肃二帝西北战略的分殊

天宝末年以河陇等军驻守潼关、朔方军主力攻敌侧翼的应敌策略，使河陇军在玄、肃之际成为关内地区最关键的军事力量。玄宗弃京西逃当夜，任命“自潼关至”、带来哥舒翰被擒消息的王思礼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即令赴镇，收合散卒，以俟东讨”。肃宗即位当日，则以“陇右节度使郭英义为天水太守”。^⑨这些第一时间的命令，共同凸显河陇在唐室政治规划中的重要地位。仔细推敲，玄宗、肃宗对河陇的安排又存在微妙的区别。此种区别出现的重要历史背景，是潼关陷落后爆发的胡乱与军队骚动。玄、肃二帝面对军乱的不同考量，反映唐廷西北政策的悄然转向，并成为西北各军镇地位升降的重要起点。

时间回到天宝十五载六月，王思礼受任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后，本应奔赴河陇整兵，但《资治通鉴》在

① 唐曹怀直墓志，赵君平、赵文成编：《秦晋豫新出墓志搜佚》，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第755页。

② 《文苑英华》卷909《骠骑大将军论公神道碑》，第4784页上栏。

③ 《旧唐书》卷185下《吕諲传》；《资治通鉴》卷218“唐肃宗至德元载”条，第6987页。

④ 《文苑英华》卷608《为人请合附表》，第3151页下栏—3152页上栏。表文提到“女婿周鼎，分阃河西”，周鼎大历间任河西节度使，参见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225—1227页。

⑤ 《旧唐书》卷111《房琯传》。《为人请合附表》提到李承光伏法是因“别承诰旨”，或与玄宗旨意有关。

⑥ “李华”另有本作“李煜”，碑文提到“峒等因欲殴（殴）击”，故疑为李峒之讹。《颜鲁公文集》卷12《正议大夫上柱国国子司业颜君神道碑铭》，颜欲章编：《颜氏传书》第22册，明万历三十六年刻本，第4b—5a页。

⑦ 《旧唐书》卷111《高适传》；《新唐书》卷129《严武传》；卷159《萧昕传》。

⑧ 《资治通鉴》卷218“唐肃宗至德元载”条，第6987页；《旧唐书》卷109《李嗣业传》。

⑨ 《资治通鉴》卷218“唐肃宗至德元载”条，第6973、6982页。

当月丙午（24）日条后、戊申（26）日条前记：

王思礼至平凉，闻河西诸胡乱，还，诣行在。初，河西诸胡部落闻其都护皆从哥舒翰没于潼关，故争自立，相攻击；而都护实从翰在北岸，不死，又不与火拔归仁俱降贼。上乃以河西兵马使周泌为河西节度使，陇右兵马使彭元曜为陇右节度使，与都护思结进明等俱之镇，招其部落。以思礼为行在都知兵马使。^①

由于潼关之败，河西蕃胡部落间爆发骚动。河西蕃落的骚动，最终演变为至德二载正月，武威九姓商胡安门物与河西兵马使盖庭伦等聚兵叛乱、杀死时任节度使周泌（泌）。^②前人关心河西粟特人事迹，曾对叛乱爆发、平定的经过作有详实梳理。^③然需注意的是，潼关沦陷后西北地区的骚动，不止发生在河西一镇。周泌之外，曾于天宝十三载受勋的彭元曜（或作耀、暉）亦受任为陇右节度使、回到本镇，似暗示陇右蕃落间也有所骚动。新刊司马志诚墓志，记志主“累迁关西都知兵马使、兼河源军使、鄯城郡太守……洎肃宗幸凤翔，以公威声坐驰，追赴行在，充兴平、定武等军使，救摄绛州刺史”，司马志诚与妻子合葬墓志又说：

天宝中，安史继乱，生灵莫安。关陇之冲，地当要害。豺（豺）狼之处，公握其权。李志坚等潜怀扇（煽）动，密运奸谋。立可寒（汗）以济师，援禄山以携众。蜂虿未肆，军师遽泉。辕门肃清，师徒无挠。丕绩克著，勋庸再加。既迁近侍之荣，用锡分忧之寄。累迁绛、陕、怀三州刺史。^④

河源军位于西平郡西百余里^⑤，是陇右的重要军镇，王思礼在天宝十三载策勋时便担任河源军使。哥舒翰收九曲后，于河源军创立鄯城郡。^⑥司马志诚大概在安禄山起兵前后兼河源军使、鄯城郡太守，至德二载二月肃宗至凤翔后前往行在。^⑦在此期间，李志坚等人曾在陇右煽动叛乱。从“立可寒（汗）以济师”等语看，陇右的骚动同样涉及蕃部，且有投靠叛军的倾向。在司马志诚的镇压下，此次骚动最终未酿成大祸。此份功绩，大概是他取得“威声”、被追赴行在的重要原因。

更大规模的动乱发生在朔方地区。至德元载七月下旬，跟随安禄山叛乱的同罗部落自长安奔归朔方。随后三四个月，尤其九月后，他们在关内道北部邀结部落“共图河、朔”，使朔方军主力不得不滞留河曲，与之作战。^⑧至德二载杜甫作《送长孙九侍御赴武威判官》说“天子忧凉州，严程到须早。去秋群胡反，得无电扫”^⑨。事实上，“去秋”以来蕃胡部落与军队的蠢蠢欲动，蔓延包括河西、陇右、朔方在内的广大西北地区，形成一种普遍骚动的氛围。

蕃落与军队的骚动，显示潼关陷落对西北军镇的冲击，并深刻影响玄宗、肃宗的政治决策。如肃宗分兵后数次调整行迹，方前往灵武。但抵达灵武不过两个月，又启程南下。^⑩西北胡乱，是肃宗前往、离开灵武的共同背景——他从平凉前往灵武，正是河西部落“争自立，相攻击”之际，离开灵武，又值朔方胡乱正炽，当一定程度受到叛胡所带来安全压力的影响。在长安沦陷的一年多里，肃宗驻留灵武的时间其实并不长。

更重要的，是玄宗、肃宗西北战略的转变。在《资治通鉴》叙述中，因河西胡乱转而以周泌、彭元曜为河西、陇右节度使，是“上”，即玄宗的命令。《旧唐书》卷10《肃宗纪》中，周、彭二人则在肃宗即位当日得到任命。^⑪面对此间抵牾，既往研究多径取一说，未见深入的比较、检讨。根据《通鉴考异》，《资治通鉴》与《旧唐书》的记录，分别源于《玄宗实录》与《肃宗实录》^⑫，是在实录阶段已产生的矛盾记载。一些旁证，为探求实情提供帮助。首先，周泌、彭元曜得到任命的前置条件，是王思礼未及到任，就返回玄宗或肃宗行在。以王思礼的资历，若早早抵达肃宗身边，当在一切草创的灵武行在扮演重要角色，但王思礼并未出现在《至德二载收复两京大赦》的灵武元从名单中。

周泌子周晓、母高氏的墓志亦提供一些参考。周晓墓志曾详述至德二载正月，年仅十七岁的志主于军乱

①⑫ 《资治通鉴》卷218“唐肃宗至德元载”条，第6979页。

② 《资治通鉴》卷219“唐肃宗至德二载”条，第7015页。

③ 冯培红、殷盼盼：《唐代“安门物事变”史实考辨》，《敦煌研究》2020年第6期。

④ 李浩主编：《榆阳区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藏志》，北京：中华书局，2024年，第192—193、196—197页。句读有改动。

⑤ 《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

⑥ 《文苑英华》卷793《田司马传》，第4193页上栏。

⑦⑩⑪ 《旧唐书》卷10《肃宗纪》。

⑧ 《资治通鉴》卷218“唐肃宗至德元载”条，第6986—6998页；卷219“唐肃宗至德元载”条，第7007页。

⑨ 杜甫著，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5《送长孙九侍御赴武威判官》，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62页。

中罹难的经过，此处想引用军乱前的一段记录：

初，凉州府君之为节制也，公亦随侍河西。终童英妙之年，吕蒙即戎之岁。或坐筹以制胜，或问绢以崇德。其所匡益，无惭古人。天子闻之，召拜赞善大夫，兼赐金印紫绶，仍许从其温清，随所任使。^①

又周似母高氏墓志：

天宝九年，从安西返枢，至临洮军权殡。令子故河西节度、御史大夫、赠凉州都督，哀毁过礼，孝能显亲。至德元年十一月十三日，有诏赠平原郡夫人，旌孝敬也。^②

周晓墓志、高氏墓志皆立于肃宗乾元二年。高氏权葬六年后，突然获得赠官，颇显突兀。而周晓随侍河西，次年正月罹难，他被“天子”即肃宗召见，亦在至德元载秋冬间。联系起来看，周晓受召、得官、被允许回到河西，与高氏突获赠官、以“旌孝敬”，是肃宗奖赏周似的系列举措，当与周似和肃宗间的某种政治互动有关。从迟来的嘉赏，及派幼子谒见肃宗等细节看，周似担任河西节度使，大概不会是由肃宗任命、自灵武赴任。在肃宗自行即位、身边多有河陇旧臣，而自己被玄宗命为河西节度使的微妙局面中，周似或许保持一种相对谨慎的态度，在九月末玄宗正式传位后^③，才与肃宗方面建立更加密切的政治关系。

至此反观玄宗的西北政策。安禄山起兵之初，玄宗并未大幅调动安西、北庭兵马。二次追征河西等镇兵士，亦限定为“守军郡城堡之外”。《新唐书》卷147《王思礼传》记哥舒翰任副元帅后，奏王思礼赴军，玄宗说“河、陇精锐，悉在潼关，吐蕃有衅，唯倚思礼耳”^④，反映玄宗尚欲保全多年经营的西北边疆防御体系，及在此前提下调动军队入援的态度。潼关沦陷后，玄宗最初命王思礼收合散卒，尚欲依靠河陇残兵平叛。胡乱消息传来后，很快转变策略，令周似、彭元曜及河西蕃将思结进明等回镇安抚、稳定局面。此种安排与玄宗对西北边军的总体态度具有一致性。《资治通鉴》将王思礼听说胡乱、折返回行在，玄宗调整人事安排一系列事件笼统系于玄宗南下河池郡后。^⑤在此之前，玄宗还有一份关于西北边镇的重要命令，即在行至扶风郡时，命丰王珙为武威郡都督，“仍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支度采访使”^⑥。学者曾十分关注玄宗在汉中命永王出镇江陵、总领山南东路等道的情形^⑦，而丰王的任命较之更早。《资治通鉴》的笼统系年，令人很难断言丰王之职是否与蕃落骚动有关。不过紧急、密集的人事安排本身，已凸显玄宗对河陇局势的关切。

肃宗对西北边镇的战略安排则大为不同。即位当日，肃宗任命郭英义为天水太守、兼“防御守捉使及大震关使”^⑧。郭英义是故陇右节度使郭知运之子^⑨，天宝十三载河陇策勋时，尚为陇右讨击副使，资历不算太深。史载他由“陇右节度使”任天水太守，不符合迁转常理。其神道碑说：

祿山之乱中原也，二圣伪游三秦，贼据汧岐，重镇非公不可。制授公秦州都督兼御史中丞、陇右采访使。未几，贼将高嵩长驱幽燕，深入汧陇。公外申郊劳，内设庭宴。餼未属厌，兵已合围。贼党数千，应时剪（翦）灭。由是虜辘不鸣于陇外，皇舆始都于雍上。至德二年，诏公为凤翔太守，转西平太守，加陇右节度兼御史大夫。^⑩

郭英义至德二载始任陇右节度使，他转任天水太守前的职衔大概是“陇右节度某使”，误脱去幕职名。据神道碑文，郭英义任天水太守的原因，是叛军占据京西汧阳、扶风一带，“重镇非公不可”。天宝十五载六月庚戌（28）日，陈仓县令薛景仙曾杀安禄山守将，克扶风而守之。不到一个月后，他与郭英义同日得到任命，为扶风太守。^⑪

① 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五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405页。

② 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94—595页。

③ 《旧唐书》卷10《肃宗纪》。

④ 《新唐书》卷147《王思礼传》。

⑤ 《资治通鉴》卷218“唐肃宗至德元载”条，第6978—6979页。

⑥ 《旧唐书》卷107《丰王珙传》。

⑦ 《旧唐书》卷107《永王璘传》。

⑧ 《新唐书》卷67《方镇表四》。

⑨ 《旧唐书》卷117《郭英义传》。

⑩ 《文苑英华》卷891《故定襄王郭英义神道碑》，第4690页上栏。

⑪ 《资治通鉴》卷218“唐肃宗至德元载”条，第6979、6982页。

这是两个具有有机联系的任命。天水、扶风腹背相倚。扶风是京西要郡，沟通东西，南达蜀地，北连朔方，是潼关沦陷后江淮赋税向关内转运的重要枢纽。^①但扶风守备力量相对薄弱，甚至依靠一介县令率众主持局面，极易受到叛军侵扰。天水则处于陇右军势力范围内，地当长安通河西、吐蕃之路，郡东大震关扼守陇山东西进出之要道^②，是唐前期税物向河陇转运的枢纽。^③在潼关沦陷、河陇本镇出现骚动的混乱局势下，唐军若不能扼住天水、阻挡叛军西扰，不仅河陇的动荡可能进一步扩大，还可能危及与安西、北庭间的联系。天水及其背后的河陇一旦陷入动乱，失去支撑的扶风便摇摇欲坠。届时东西、南北交通阻隔，避处成都的玄宗尚且安全，居于灵武的肃宗无疑处于极危险的境地。

故肃宗急命天水太守的举动，具有多重意义。郭英义就任后，欲擒故纵地翦灭贼将高嵩。此事亦见于《资治通鉴》，记七月甲戌（22）日、己卯（27）日间“安禄山遣其将高嵩以敕书、缯彩诱河、陇将士，大震关使郭英义擒斩之”^④，很快起到防止叛军进一步裹挟河、陇将士的作用。此外，郭英义以天水太守带陇右采访使，他的经营不仅有助于稳定陇右局势、支撑京畿西翼，还为肃宗安心南下、“皇舆始都于雍上”创造条件。至德元载九月后，肃宗离开灵武，经顺化、彭原逐步南下。在此期间，他持续从西北诸镇征召军队，十二月又命王思礼为关内节度使，并将郭英义内调为凤翔（即扶风郡）太守。^⑤如此逐步准备，以便最终移驾扶风，以之为收复长安的基地。这一系列规划，最早可追溯到肃宗即位当日任命天水太守、扶风太守。肃宗最初任命薛景仙、郭英义时，未必已明确移驾扶风的目标。不过，在同罗搅动的朔方胡乱，河陇连通安西、北庭的战略纵深及扶风“十字路口”式的地理区位等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以扶风为收复两京的基地成为越来越清晰的战略方向。

回过头看，肃宗的人事任命与玄宗的安排形成一种张力。玄宗着眼于河西、陇右及安西、北庭的整体局势，仍希望维持西北边防体系。肃宗则更多从自身处境出发，关心更小区域内的战略安排。肃宗分兵、即位后，安西、北庭兵马被初次征调入援。河西、陇右军虽经历潼关之败的折损，又有部落、军队骚动，肃宗仍持续从河陇抽调兵马。为了配合肃宗以扶风为基地收复两京的战略安排，河陇军的经营重心逐步东移。学者曾论安史之乱是唐朝西北防御体系崩坍、疆土丧失的重要转折点，更进一步看，唐廷的西北政策，实在肃宗初年迎来转变的关键节点，这一时期，西北边防越来越明显地让位于平叛需求。而随着西北各镇兵马陆续入援、会集，河陇军早期占有的优势地位也迎来挑战。

四、收复京城诸役与西北军镇地位的变化

探明安史之乱初期河陇军具有的关键地位及唐廷西北政策的转型后，可将研究视线重新投向朔方军。在有关肃宗朝史事的各式论述中，朔方军长期是西北军镇中最为突出的角色。此种“主角”形象至少受到三重历史叙述的叠加影响：当代学者带有“后见之明”色彩的研究，《资治通鉴》等基本史籍的编纂、叙事策略，再往前追溯，还有同时代人对朔方军崇高地位的不断烘托与制造。^⑥如果说本文前几节通过考订肃宗北上经过与灵武行在构成，致力于破除肃宗初年朔方军的“主角”形象，本节则希望重新探讨朔方军重要地位的建立过程，并借此进一步梳理唐军作战策略调整下西北各镇地位的变动。

至德年间，肃宗行在曾组织多次以收复两京为目的的战役。除至德元载十月房琯主动请缨、仓促惨败之役外^⑦，其余战役均以扶风为基地、以西北诸镇军队为主要班底展开。诸次战役中，各镇扮演的角色各不相同。起初，河陇军仍在肃宗的军事安排中居于核心位置。至德二载正月，肃宗在《谕西京逆官敕》中宣示唐

①④ 《资治通鉴》卷 218 “唐肃宗至德元载”条，第 6995、6986 页。

②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 2 卷《河陇碛西区》，第 360—364 页。

③ 大津透：《唐律令制国家的预算——仪凤三年度支奏抄、四年金部旨符试释》，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 六朝隋唐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第 430—484 页。

⑤ 《旧唐书》卷 10 《肃宗纪》。

⑥ 如杨炎撰《灵武受命宫颂》，称李光弼、郭子仪曾与广平王李俶等一同于灵武劝进。《通鉴考异》引《汾阳家传》，称玄宗命肃宗即位，郭子仪“跪上天子玺”。《文苑英华》卷 774 《灵武受命宫颂》，第 4076 页上栏；《资治通鉴》卷 218 “唐肃宗至德元载”条，第 6991 页。

⑦ 《旧唐书》卷 111 《房琯传》。

军进攻京畿、东都、范阳的计划。其中郭子仪“领朔方精骑三万、步卒五千并回纥兵二万人”、王思礼“领安西、北庭、河陇马步五万”负责京畿战场，有着收复长安与潼关一线的战略目标。^①实际作战中，肃宗延续哥舒翰守潼关时的战略规划，仍命河陇军将主持正面战场、朔方军攻敌侧翼。当年正月，郭子仪派人潜入河东郡，后率军平定冯翊、河东，在潼关与叛军拉锯，取得一定战果。长安方面，二月，肃宗命关内节度使王思礼驻军武功，兵马使郭英义驻军东原，王难得驻军西原，三位前河陇军将肩负起收复长安的重任。然当月丁酉（19）日，叛军进攻武功，郭英义作战不利，王难得望之不救，两军溃退，王思礼亦退军扶风，行在戒严。^②

至德二载春战事的失败，是一次标志性事件，它暴露河陇军战力的不足，并宣告天宝十四载以来以河陇军担纲主战场、朔方军侧面进攻的两线出击战略的破产。此役之后，郭英义被调回陇右，成如璆“代英义收其余卒于岐（岐）山，抚其疮痍，招其逋散”，在郿县东原设置兴平军。^③成如璆之后，司马志诚、王难得也曾领兴平军使。^④天宝十三载河陇策勋时，成如璆任临洮太守、莫门军使，当年七月哥舒翰在新开九曲之地置洮阳郡、神策军，又兼洮阳太守、神策军使。^⑤安禄山起兵之初玄宗征召边兵，“守军郡城堡”者被排除在外，成如璆应属留守之列。成如璆、司马志诚等留守军将陆续出现在京畿战场，反映肃宗进一步抽调河陇守军的趋势。兴平军历由多任陇右旧将统领，大概不是旧有的成建制军队，而由不同批次入援的河陇军士整合而成。历经多次战事，长期担纲主战场的河陇军，或许是旧有建制受战争冲击最严重的西北军镇。

于朔方军而言，此役则成为它崛起的重要转折点。至德二载四月，除少数留守者外^⑥，朔方军主力被召赴凤翔，后与王思礼军会合，在京西清渠一带与叛军相持。五月初，叛军伪退，郭子仪“悉师逐之”，被首尾夹击，唐军再次大败。战后，郭子仪诣阙请罪，被降为左仆射。^⑦朔方军主力加入未能挽救西线战场的颓势，成为郭子仪建议肃宗再次向回纥请兵的契机。

肃宗初次向回纥请兵在至德元载九月。时同罗等胡数万聚集于经略军北，威胁到灵武安危，于是肃宗派朔方部将仆固怀恩出使回纥请兵。援兵在十一月抵达，协助平定了河曲胡乱。^⑧至德二载肃宗再次向回纥请兵之事，史无明确记载。《资治通鉴》记九月“郭子仪以回纥兵精，劝上益征其兵以击贼。怀仁可汗遣其子叶护及将军帝德等将精兵四千余人来至凤翔”^⑨，因援兵抵达，交代郭子仪劝肃宗再征回纥兵的前情。对此，《唐会要》提供一条关键材料，记唐军败于清渠后，“乃遣中官窦议使于回纥，令发其兵”^⑩。联系《资治通鉴》的记载，郭子仪应在五月清渠之战败后，提出再次请兵的动议，肃宗因遣中官窦议出使回纥。安史之乱中，回纥援军曾为唐军平叛发挥十分关键的作用。而肃宗初年数次向回纥请兵背后，都有朔方军的身影。史载九月中旬回纥首领抵达后，与朔方将士见郭子仪，“宴设三日”^⑪，双方有着显而易见的密切关系。

此种密切关系影响到肃宗对朔方军的军事安排。至德二载九月下旬，各方援军会集之际，肃宗以广平王即代宗为元帅，统号称二十万大军，发起潼关沦陷后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⑫唐军在此役中分为前、中、后三军。《册府元龟》记三军统帅，分别为“安西、北庭行营节度使”李嗣业、“朔方、河西、陇右行营节度使”郭子仪及关内行营节度使王思礼。^⑬《新唐书》卷137《郭子仪传》则记“元帅为中军，子仪副之”^⑭，中军实

① 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118《谕西京逆官敕》，第617—618页。

② 《资治通鉴》卷219“唐肃宗至德二载”条，第7017—7022页。

③ 《宋本册府元龟》卷398《将帅部·抚士卒》，第1015页下栏。

④ 《旧唐书》卷183《王子颜传》；李浩主编：《榆阳区古代碑刻艺术博物馆藏志》，第192—193页。

⑤ 《资治通鉴》卷217“唐玄宗天宝十三载”条，第6927页。

⑥ 如河东太守马承光，参见《资治通鉴》卷219“唐肃宗至德二载”条，第7025页。

⑦ 《资治通鉴》卷219“唐肃宗至德二载”条，第7022—7023、7025页。

⑧ 《资治通鉴》卷218“唐肃宗至德元载”条，第6997—6998页；卷219“唐肃宗至德元载”条，第7007页。

⑨ 《资治通鉴》卷220“唐肃宗至德二载”条，第7032页。

⑩ 《唐会要》卷98《回纥》，第2068—2069页。

⑪ 《旧唐书》卷195《回纥传》。

⑫ 《旧唐书》卷10《肃宗纪》。

⑬ 《册府元龟》卷20《帝王部·功业第二》，第215页上栏。

⑭ 《新唐书》卷137《郭子仪传》。

由广平王亲统，郭子仪为副。其军队主体为朔方兵马，根据仆固怀恩领回纥兵作战、代宗“亲率回纥锐卒”等记载^①，知还包括回纥援军。此外，《旧唐书》记管崇嗣在此役中担任广平王都虞候^②，《至德二载收复两京大赦》表彰灵武元从，记管崇嗣为“中军都知兵马副大使”，李鼎为“中军都虞候”^③，中军还包括早期扈从灵武的部队。这大概是郭子仪头衔中“河西、陇右行营节度”的来源。上述配置，使中军成为三军中最核心、精锐的一支部队。

不过半年时间，朔方军渐取代河陇军，成为唐军平叛力量的核心。至德二载正月《谕西京逆官敕》中，安西、北庭援军被归入王思礼辖下。马磷神道碑记“初，公自二庭统甲士三千，赴风翔行在……遂战青渠，阵泮水”^④，马磷曾率军参加五月的清渠之战，当时大概仍受王思礼节制，未单独成军。到九月，则出现独立的、由原安西节度副使李嗣业统领安西、北庭行营为主体的前军。与之相对，过去担纲主战场的王思礼，此时成为后军统帅。《至德二载收复两京大赦》中，王思礼头衔为“持节充招讨西京并定武、威武、兴平等军兼关内节度、河西、陇右、伊西四镇行军兵马使”^⑤，后军以陆续入援的河陇军队为主体，或许也兼以部分安西、北庭援兵。名义上，宿将王思礼当统领这些部队进攻两京，但实际作战中，亦可见分兵单独作战的倾向。如十月壬子（8）日，兴平军奏破贼于武关，克上洛郡。^⑥唐军主力东进时，至少部分兴平军兵马未全程跟随王思礼进军，而是分兵向南、保义京畿南缘。

王思礼是一位资深河陇军将，曾与哥舒翰对为王忠嗣押衙，哥舒翰守潼关时，“每事独与思礼决之”。^⑦玄宗以他接替哥舒翰，担任河西、陇右节度使，肃宗则命他为关内节度使，主持京畿战场。朔方军后期具有的崇高地位及史籍对此的烘托，使人们很难意识到潼关破后王思礼在军事上一度扮演的重要角色，及此重要性逐渐丧失的过程。而王思礼的经历，同时也是河陇军地位变化的一种投射。肃宗起初对河陇军寄予厚望，但战事的屡次失利，使他们从作战主力渐降为后军之一隅。由于元从功劳，许多河陇系官员此后尚能取得政治上的优待，但就整个军团而言，军事地位的衰落极为明显。

与河陇的衰落相对，朔方及安西、北庭的军事地位在战争磨炼中逐步确立。史载九月大战中，唐军军阵初乱，李嗣业身先士卒，仗长刀立于阵前，手杀数十人，“由是前军之士皆执长刀，如墙而进，所向摧靡”^⑧。收复两京大赦表彰平两京功臣，依次奖赏广平王、郭子仪、仆固怀恩、李嗣业、李光弼、王思礼、来瑱、鲁灵、崔光远、李光进。^⑨从这份名单中，可以直观感受到西北各镇军事地位的升降。

结语

玄、肃之际，是唐朝旧有政治秩序破坏、新秩序重建的关键时期。潼关陷落后肃宗的行动，为探究混乱局势中秩序重建的过程提供重要新视角。有别于既往研究对灵武即位、朔方军重要地位的循环论证，肃宗分兵后，并未确立“前往灵武”的清晰目标，而是依据各种信息反复决策，不断调整行进路线。与玄宗分别后，肃宗一度计划回师长安，也曾考虑河西方向或驻军丰安，在蕃落骚动背景下，他前往灵武，又很快南下，最终长期驻于扶风、以之为收复两京的基地。

总体而言，通过安史之乱初期肃宗的行动与决策，可注意到三个层面的历史变动。首先是即时的形势变化。如潼关破后西北地区接连的胡乱与军队骚动，两京陷落后扶风联络东西、沟通南北的关键地理区位。其次，是对旧有军政格局的继承与调整。受玄宗以河陇等军驻守潼关、以朔方军主力进击河朔战略安排的影响，河西、陇右军在潼关破后短暂的权力真空期中成为十分关键的力量。于“一切草创”的肃宗而言，河陇军，

① 《旧唐书》卷 121《仆固怀恩传》；《册府元龟》卷 20《帝王部·功业第二》，第 215 页上栏。

② 《旧唐书》卷 128《颜真卿传》。

③⑤⑨ 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 123《至德二载收复两京大赦》，第 658、659、658—659 页。

④ 姚铉编：《文粹》卷 57《故四镇北庭行营节度使扶风郡王赠司徒马公神道碑铭》，《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国图藏宋绍兴九年临安府刻本，第 17 页。

⑥ 《资治通鉴》卷 220“唐肃宗至德二载”条，第 7037 页。

⑦ 《旧唐书》卷 110《王思礼传》。

⑧ 《册府元龟》卷 20《帝王部·功业第二》，第 215 页上栏。

而非传统观点中的朔方军，成为他即位之初的重要依靠。裴冕等河陇系官员在行在政治、军事规划中起到主导作用。不过，随着各方兵马会集、平叛压力持续，与回纥关系密切的朔方军，乃至较晚入援的安西、北庭军渐取得军事上的重要地位。一些河陇系官员虽因元从经历仍活跃于朝堂内外，河陇军的军事地位却因作战不力逐渐衰落。战争影响西北各镇的地位，逐渐催生新的军政格局。

更深层次的变化，是唐廷西北政策的悄然转变。在执政的四十多年间，唐玄宗继承前代经营，着力开拓西北，逐渐建立以节度使为核心的边疆防御体系。即使在叛军势如破竹之际，也仅有限征调河西、陇右、朔方兵马，尚欲保全西北边防。肃宗分兵、自立后，为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保全自身、积蓄力量、完成收复两京的政治目标，则不断抽调西北守军入援。在此过程中，一方面，西北军镇越来越深地参与到国家军政体系的重建中。另一方面，随着边防让位于平叛、国家经营重心东移，西北边疆守御力量渐趋薄弱，大量疆土在未来数十年间逐步丧失。玄、肃之际西北政策的转变，由此还成为唐代国家转向的一个重要节点。

(责任编辑：周 奇)

The Ascension at Lingwu and the Shifting Status of Northwest Military Governors during the An Lushan Rebellion

YUE Sitong

Abstract: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An Shi Rebellion, Emperor Suzong's journey was the result of repeated decision-making and constant adjustments to his route based on a continuous flow of information. Emperor Xuanzong ordered generals from the Hexi and Longyou regions to take command of the defense of Tongguan while deploying the main forces of the Shuofang Army to attack Heshuo. This strategic arrangement placed the Hexi and Longyou in a politically and militarily pivotal position during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An Lushan Rebellion. Unlike Emperor Xuanzong, who sought to maintain the northwestern border defense system, Emperor Suzong, in order to quell the rebellion, continuously summoned frontier troops for reinforcements. In the campaigns to recapture the two capitals, the Hexi and Longyou forces suffered successive defeats, while the Shuofang Army, along with the Anxi and Beiting armies, gradually assumed a more significant military role. The actions of Emperor Suzo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northwestern military governors' power illustrate the process of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Tang Dynasty's state power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rebellion.

Key words: An Lushan Rebellion, The Ascension at Lingwu, Hexi and Longyou, Northwest Military Governors